

探索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路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叶自成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进入 21 世纪之时，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在 21 世纪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将如何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中国要采取怎样的战略来推进世界多极化？这些都是我国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1997 年 7 月 14—18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山东青岛主办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高级研讨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中共中央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人民日报国际部、光明日报国际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南开大学政治系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者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将会议的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构筑中国面向 21 世纪国际战略的指南

蔡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博士）指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我们分析国际形势和制定国际战略的指针。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当今世界的主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应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不与任何大国结成战略盟友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坚持全面开放，开放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世界形势多变之时，中国应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一国两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于中国统一，对解决国际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傅耀祖（外交学院学报主编，教授）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邓小平的时代观与西方国家不同，强调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是中国确立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的基础；在观察当代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时，邓小平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论点，强调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这与西方的全球化论

点也是不同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从核战争下不可能有胜利者这样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而是强调和平力量的发展，强调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强调欧洲的发展，并把这些作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依据。

冯特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认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反对单极世界，推动形成包括美俄日欧中和第三世界在内的多极世界论；以对西方国家开放为中心的全面开放论；以冷静观察，善于守拙，有所作为为核心内容的外交策略论；维护本国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与会者还对如何运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来具体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梁宇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认为，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和教学工作，应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而不断努力。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在 21 世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作出准确的判断。他指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应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国两制的国家等来定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强调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中国特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自己的判断，以新的内容新的理论丰富和充实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真正形成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为此，他倡议高校和外事机构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建立协作网络，深入研究中国的国际战略，为中国的外交决策出谋划策。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大使）认为，现在国内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缺少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各外交外事部门，教学单位和研究机构各自为阵，互不通气，缺少交流和协调，希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能做些沟通信息和协调研究的工作。

二、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的基础

何芳川（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指出，香港回归，澳门将于 1999 年回归，台湾也必将回到祖国的怀抱，21 世纪的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中国将进入 5000 年历史上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将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出现在世界东方。中国在汉唐盛世时就已形成了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为当时的东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强盛之世时，中国也必须思考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现在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日本有雁行战略，要以经济政治军事大国态势争作亚太国家的领头雁；美国有所谓的扇形战略，要把亚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拉进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韩国提出了风筝战略，提出要在大国并存之世，力争发挥其最大作用。还应认识到，信息革命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将使世界发生象 17 世纪那样的大变化，美国日本和欧洲发展都很快，这一趋势的发展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应引起高度重视。

蔡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博士）认为，当前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但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美日俄欧中五大力量中心中，美国居首位，但地位相对下降。世界多极化在政治，经济领域，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都有发展，这是对国际形势的一个总的判

断。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大国都在积极发展和调整对华关系。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长期的，美国一极主导世界与世界多极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美国在冷战后强化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表现为北约东扩，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其它大国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不具备单独与美国对抗的条件，美国是影响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的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在经济上也是如此。美国仍居主导地位，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经济发展有活力，连续75个月增长，是二十年来少见的。在高科技方面美国也遥遥领先，这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

蔡武指出，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是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一大特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从1974年占世界总产值的13%上升为1995年的27%，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1%上升到32%。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在地区性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也要看到，西方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国内改革等方面的困难还很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不平衡，两极分化的趋势在发展。

蔡武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何定义全球化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仅限于马克思列宁时的认识。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减少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全球化中的经济利益又导致国家关系紧张，南北矛盾增大，关键问题是一个争夺世界经济规则主导权的问题。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是对西方有利的，西方国家力图使它固定下来，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进行调整，反对西方把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强加到自己头上。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有所发展，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国家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劳工就业条件和环境保护等，这其中也有许多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

谷源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把当前的世界形势概括为“五化”，即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一体化和多极化。这些特点为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领域。在这些基本趋势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6个特点：一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又有合作，斗争促进合作。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竞争使人学会遵守规则，但全球化的规则是西方制订的，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些规则中，哪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部分可以接受的，哪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二，协调、妥协成为各国解决问题的模式。第三，控制制订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的主导权成为大国争斗的中心内容。虽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已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对其它国家发号施令。西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在制订规则上反映自己的利益。第四，南北合作在发展，但矛盾仍然存在。反对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往往把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中国要坚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这面旗帜不能丢。第五，南南合作不断扩大，但南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也有发展的势头。第六，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追求目标，成为全球合作的一个新的动力源，这一目标可团结更多的国家，共同追求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在人口问题、能源、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各国必须进行合作，但也要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也有干涉发展中国国内政，牺牲别国利益来追求自己发展的一面，发展中国家也要与此进行斗争。

三、中美关系对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具有全局性意义

詹世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大使）指出，邓小平关于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思想，是我们思考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詹世亮认为，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上摇摆很大，1989 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以压为主，把人权与贸易挂钩，中美关系不断下降。由于 1992 年后中国继续发展，克林顿才不得不宣布人权与贸易脱钩，但美国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不少人认为中国将谋求东亚霸权，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 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再次下降。现在克林顿政府开始从全球战略来看中国问题。美国许多领导人强调，21 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全球民主化，美国要领导一个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那么，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会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一部分人认为，中美将会发生冲突；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到 21 世纪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不拥有形成对美国威胁的军事力量，中国不谋求霸权，中国将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

詹世亮指出，美国要建立一个单极世界是有困难的，首先是美国力量相对削弱，欧日俄中都在发展，力量越来越大，谁是美国的对手有多种可能性；其次，美国的全球民主化与全球经济化的两大基本目标存在很大的矛盾，美国往往从经济利益考虑问题，在民主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使其对外政策摇摆不定；最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与其实力有较大矛盾，所以不少美国人也认识到，美国的全球主义注定要失败，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敌人都不会接受。

詹世亮指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华政策的共同目标都是要把中国拉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中来。一方面要加强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要防范中国。在对华政策的大争论中，不少美国人认为，美中仍然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中美关系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关系。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国利益和世界和平。但美国也会以人权、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国内主张现在就遏制中国的力量仍很强大，不能过于乐观。

马世琨（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高级记者）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是：两国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在分析克林顿第二任期中的对华政策的特点时，马世琨指出，克林顿政府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孤立中国，实行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希望中美关系发展，在总结过去的对华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可能比第一任期时与中国有更多的接触、合作和调整。但美国国内对此也有压力。军事工业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鼓吹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美国的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中国严重损害美国经济利益；形形色色的宗教、人权组织、工会、自由派分子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国会中出现奇怪的联盟，民主党和共和党平时相互敌对，现在却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一致，美国成了这个联盟的受害者；美国报刊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攻击中国；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的战略也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所以，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有限的，好不到哪里去。另一方面，美国一超与各强的矛盾也有发展，各大国利用这一格局限制美国，它们借重中国推动多极化的发展；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仍在欧洲，美国要避免在东西两线同时与中俄为敌；其次，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中占到 6.1%，美国在华投资达到了 142.8 亿美元，而且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在 2000 年时将有数千亿美元，这对美国经济利益也有很大影响；最后，美国国内反对遏制中国的力量也较大，因此，中美关系要坏也坏不到哪里。所以，中美关系可能时好时坏，麻烦不断，但也不

会有大的逆转；中美关系不管多么紧张，也不会阻止中美经济往来的扩大；但中美经济往来不管怎么扩大，也不能解决中美两国的矛盾。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美关系还很脆弱，有许多困难，要看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要在战略上有准备。中美关系不从战略上考虑，很难有所作为。一方面，美国冷战思维很强，但美国国内对冷战后的格局也是有思考的。克林顿等美国领导人都说过，中国的未来决定亚太地区的未来，中美关系的未来要决定世界的未来，中美关系最重要，超过任何一种双边关系。美国不期待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但也怕中国不合作；虽然美国国内反华浪潮来势大，但研究中国和亚洲的热潮也是空前的。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的议题应把维护东亚和亚太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双边经济利益，在世界粮食、能源、环境保护上的合作作为主要内容；在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中国不能以急躁情绪与之对抗，应学会韬光养晦，既不惧外，也不排外，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要多层次进行，既要有最高层次的，也要有部长级的和民间学者的接触；此外，中美战略对话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在讨论有关粮食、环境、能源问题时，应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参加。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主任，教授）认为，对中美两国的矛盾和困难的一面要有充分和足够的估计。他指出，克林顿上台后，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一调整未得到国内的认同，这是与布什时期不同的。许多美国人表面上认同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的政策，但内心里是遏制思维。国会、人权分子、宗教人士、工会活动家、报刊新闻记者对中国大多抱有敌意，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了，但对华政策的争论并未结束。随着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到来，出现变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相对于贸易磨擦、军售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政治捐款等问题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国内在六四事件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偏见，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敌意宣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美国人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美国国内党派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些是对中美关系发展不利的四个长期的因素。

叶宗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认为，克林顿政府从未放弃美国独大的思维，冷战后一步一步地在巩固这种单极世界的格局，表现为北约东扩和日美安保条约扩大等。1995年美国虽然调整了对华政策，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但其遏制的冷战思维未变。克林顿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国内的压力，要受到牵制。所以，还很难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接触政策，其中也包含遏制，也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有浓厚遏制色彩的接触政策。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大使）认为，对一超多强的格局应进行认真分析。美国一些人认为，美国现在的战略不是要维护一超多强的格局，而是要利用美国现在的一超地位为美国在未来的秩序中占据对美国最有利的地位作安排。他们认为，俄罗斯和日本将会衰弱下去，更重视的是欧洲和中国。美国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但又是唯一在欧洲和亚洲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美国的战略不是与中国对抗，而是要引导中国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中去。在未来的发展中，美国的经济将从现在占世界总产值中的20%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10%，而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也会下降。到21世纪中，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就会大体完成。

杨成绪认为，中美有较大的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美国想对中国进行遏制，但办不到，不得不考虑调整对华政策，所以，关键在中国怎么处理与美国关系。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会使美国继续调整对华政策。今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从较多的遏制

变为较多的接触，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克林顿表示要去中国访问，也邀请江主席访问美国。1997年初，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任后，第一次出访的国家中包括了美国，这是第一次，还把中国作为“守法国家”和伙伴国家，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华后，观点也有所改变，认为中国实力比美国落后很多，不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威胁。所以，中美两国虽然有许多分歧，但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没有中国，美国在亚太做不了什么大事。美国一方面把中国视为对手，另一方面又要借重中国。

湛取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很复杂，在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上尤其如此，有些可以公开说，有些不好公开说，有些很容易达成共识，有些则需要矛盾和斗争中，经过双方的艰苦努力才能发现。美国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与中国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是矛盾的，但美国也承认世界上有几个力量中心存在，这其中是否也包括一些共同点呢？又如，美国声称反对在任何地区出现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力量，这显然有针对中国之意，但这其中是否也包含对日本和俄国的考虑呢？再如，美国的战略就是要将中国拉入西方的体系中去，要中国按西方的准则办事，这显然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但中国要扩大改革开放，要与世界接轨，这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要增加在朝鲜的影响，有削弱中国影响之意，但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动荡，这与中国也有共同语言。所以，中国在对美关系上，要小心谨慎。不管美国力量多么强大，还是要试图与中国寻找战略共同点的。

谷源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美国一直追求其战略目标，但这些目标的内容的先后有变化。1993年时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利益、军事安全和全球民主化，1994年的顺序是军事安全、经济利益、民主化，1996年又变成了军事安全、民主化和经济利益，这反映了美国并不完全从经济利益来考虑问题；第二，1997年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不能说明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它对美国政府产生了牵制作用，同时又不能对这种牵制作用估计过高。有几件事反映了美国要维持对华政策：一是做工作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二是放弃了抵制香港临立会的立场，三是在台湾“修宪”上表示美国不希望台湾出现动荡；第三，在中美关系的定位问题上，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最后目标是分化和西化中国，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明确表示要与中国进行对话，保持接触；第四，中美关系很脆弱，其前途有两个，一是全面对抗，二是协调发展，中国从战略上考虑，应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

潘振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少将）认为，未来时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危险时期，也可能是世界多极化形成的时期。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可能是最不稳定的，最不确定的关系。中美关系存在许多重大问题，双方的战略也不明确。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战略思想，但正在形成一种主流意见，中国大体上有一个对美战略，但不明确，只是被迫作出反应。国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大体是几种意见：似友非敌，非敌非友，时敌时友，似敌非友等。在实际中，我们的对美政策在关键时刻也时有摇摆。都承认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可以说，不解决中美关系，什么事情也解决不好。但有一阵又想突破中欧关系来加强中美关系，有时又想争取中日关系有较大发展。现在看来，中美关系不好，中欧中日关系难以有大的进展。我不同意说美国相对衰弱，这不合乎事实，美国在冷战后地位明显上升，不管相对还是绝对都是如此。美国在各地区的影响力都在上升，不是下降。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力量

对比上与其它大国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说美国的影响力下降，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比过去扩大了，有些力不从心。美国人想干的事，大多能干成，美国人不想干的事大多干不成。其次，我们在对中美关系中的冲突和利益怎么看的问题上也有摇摆：在关系恶化时，对共同利益看得不够，而关系较好时，对存在的问题有所忽视。中美关系不同于任何一个大国关系，十分复杂，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在冲突中也有共同点，但冲突是主要的。美国要改变中国的价值观，要削弱和牵制中国，在战略构想中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可能象对苏联那样对付中国，需要中国配合，最怕中国不合作，如果中国不合作，美国许多事不好办。所以，美国要在不破坏和平和稳定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去。一些美国人认为，接触政策不成功再来遏制中国也不晚，现在中国太弱了，不足以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遏制是美国各方的共识，在军事上更为明确。但争取中美关系在较长时间中稳定下来，还是可能的。要尽可能地保持与美国的协调关系，在有冲突的地方实行外交控制，不再激化。所以中美关系不会走向真正的对抗。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要有斗争和妥协两手，要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并用，把握好斗争的度。

潘振强认为，要从世界战略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亚太，任何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有关，必须在亚太营造一个有利中美关系发展的条件，亚太地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对中国是有利的。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格局对中国不利，把亚太各国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中国有利。日美军事联合对中国的消极面大于其积极面，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大于对中国的同情，对中国是一种威胁，日美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威胁最大。日美条约解除之时，也许就是亚太多极化形成之时。但中美关系的真正稳定，还是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和政策。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军事力量发展，什么事都好办，如果内部出现问题，中美关系就可能走向消极。

四、中俄欧关系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罗肇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在分析中俄关系时指出，中俄关系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俄友好符合两国的利益，它超过了中苏关系友好时的关系，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中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怎样发展经济合作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理论上说容易，做起来很困难。俄罗斯经济现在较困难，这使中俄关系的基础不太牢固，但在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发展起来后，中俄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又很难说。对中俄双方而言，对美国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要在这一前提下处理中俄关系。中俄两国有很长的边境线，存在一些领土问题和移民问题，也有历史上的问题。尤其是俄国国内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多，民间往来较少，远不如中美民间交往那样广泛，这也是很让人忧虑的。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认为，中俄关系是冷战后大国关系中发展最快的，政治关系最密切的关系，中俄关系年年在上升，年年有发展，1992年到1997年，中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俄关系最大的成果在政治方面。两国有4300公里长的边境线，都在进行改革，进行经济建设，都承认各国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都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对过去的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有所认识。中俄关系是比较合理和适当的。从俄国情况来看，对华友好是几乎所有政治力量的共识，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主要表现在独联体和对西方的政策上，今后不论谁上台，都要集中精

力解决经济问题，俄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中俄关系在经济方面相对落后，现在双边贸易额才 68 亿美元，要在 2000 年达到 200 亿美元的目标有很多困难，即使达到了，也与两个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仍落后于中美中日经济贸易规模，甚至也大大落后于中韩贸易额。黄宗良认为，在中俄关系上，我们对俄历史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扩张主义对今天的俄罗斯的影响，对俄罗斯重新崛起后会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应当有所认识和思考。

潘振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可预见的格局中，所有大国都无法取代俄罗斯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俄罗斯将来发展了，它的战略重心也仍在欧洲，与之冲突的主要是西方，在未来的大国关系中，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即使与俄罗斯在远东发生冲突，也是有限的；中俄主张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又保持其独立自主性，这种关系不是脆弱的，而是可以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从军事上看，俄罗斯是中国军事安全的不可取代的因素，中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主要来自于俄，俄罗斯的军事武器在改变对台军事力量对比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亚太地区适当引进俄罗斯因素，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也是有利的。当然，我们在发展中俄关系时也要考虑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俄关系在中国与所有的大国的关系中，发展最好，在总体上好于与其它大国的关系。中俄关系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结盟，真正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双方以大局为重，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是未来良好的大国关系的一种雏形。叶自成认为，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不必担心俄罗斯强大后重新成为中国的威胁，一个大而不霸的俄罗斯好于一个弱而不乱的俄罗斯，它更有利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更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俄在历史上有过大国主义，现在也有不少人怀念那种东西，但俄罗斯多数人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完全走回头路；中俄关系中政治军事关系发展较好，这其中有美国因素，但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长久的战略考虑，它主要还是从两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完全随中美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叶自成认为，中俄关系基于对过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俄两国有过几百年接触的历史，双方对对方了解是较多的，中俄两国现在的友好关系，并不脆弱。俄罗斯不仅在中国的国防建设上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中国西北部的安全，主要有赖于中国与邻近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在较大程度上也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关。从总体上看，虽然两国存在一些问题，但共同利益，双方的合作和协调，远大于双方的矛盾和分歧。

俞正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教授）认为，中俄关系发展较快，但不牢固，受对美关系的影响较大。如果双方与美国关系变化，那么中俄关系的基础也会发生变化。今后要建立一种正常的真正的大国关系，现在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好的苗头，中俄两国在边境问题和亚太安全体系上取得的进展，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不针对第三国，真正有利于两国利益。但现在中俄关系的经济发展没有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思考国际战略时，要超越过去的地缘政治强权政治的思维，从新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大国关系。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对中欧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欧关系发展较早。在冷战后，欧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美欧的共同敌人消失了，欧洲独立的声音比过去更高，不再事事支持美国，而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维护欧洲的利益。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似乎与美国一致，但实际上，二者有较大的差别，欧洲强调社

会公正，经济民主，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单极世界等进行了批评。中欧双方都面临美国的压力，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这一方面，欧洲可以成为中国的重要伙伴。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有不同的形式，一是法国式，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与中国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另一类是德国式，强调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再一类是欧洲小国模式，与中国关系不密切，经常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抗。但欧洲的主流是大国模式。如果欧元启动，美欧在经济上的矛盾可能比现在更大，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空间也更大。但欧洲与中国发展关系也有两个较大的问题。一是欧洲的社会党现在大多处于执政党地位，而社会党执政的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向来较差，如法国社会党 1981—1995 年执政时，法中关系就没有真正好过。它们总是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处于对抗状态，以显示自己与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不同。二是欧洲议会，对中国也不太友好，如果欧洲用一个声音讲话，可能与中国也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五、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中的东北亚

千辰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他在发言中指出，21 世纪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将起更大作用。中国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对朝鲜半岛和整个亚洲的稳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1992 年中国与韩国建交，表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前形势下，中国要维持半岛的现状，希望从韩国获得经济和贸易利益，从朝鲜获得政治和军事利益，限制日美的影响。但韩朝关系紧张，中国怎样去做，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在半岛上有最好的关系，与韩发展关系而不忽视朝，逐步推进，较为谨慎。中韩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发展较快。中国与朝鲜关系保持了传统的友谊，而中韩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1980 年两国经济贸易额才 1.8 亿美元，1985 年为 6.4 亿美元，1996 年为 198 亿美元，1997 年将达到 23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 3 大贸易伙伴，韩成为中国的第 5 大贸易伙伴。韩在中国的投资也在上升，1991 年为 850 万美元，1995 年为 12 亿，1996 年为 16 亿美元。韩国投资的 25% 在中国，中国成为韩国投资的热点，韩国的大公司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中国与韩国在 2000 年的贸易额将达到 400—500 亿美元，韩在华投资有可能达到 200 亿美元。中韩关系不仅在经济关系上发展很快，政治关系也有很大进展，双方的高层互访不断，民间来往人数也急剧上升，1994 年访华的韩国人有 35 万人次，不久将达到 100 万，在中国的留学生也有 3500 人之多。中韩在军事上也有互访。中韩两国在对日关系上有共同利益。韩国不担心中国国力的上升，把中国视为很好的朋友，没有中国的支持，南北两方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中国可以利用现在的时机扩大影响，但美国也试图改善朝鲜关系，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中国支持朝鲜与日本和美国改善关系，但不愿看到日本和美国利用朝鲜对付中国。现在中朝韩三角关系还不稳定。

车铭洲（南开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认为，应用亚洲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亚洲。当前西方控制东方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亚洲各国要致力于打破这一格局，争取亚洲的独立平等。这也是中国 21 世纪的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这里的关键在于中日印等亚洲大国的关系。亚洲国家要发展，应把重点放在亚洲，先实行亚洲一体化，再向世界一体化发展。中日友好在亚洲国家的团结中占有优先的地位，应世代友好。如果相互敌对，就会为西方所利用。这也不是针对西方，而是要争取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平等。

方连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指出，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中日之间结束了友好蜜月时代，两国关系在发展的同时，不利、困难和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困难加大了，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目前两国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使中日关系大大倒退；日美安保条约的扩大化，矛头是对准中国的，这违反了中日友好条约的内容；第三个问题是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不反省，不认罪，影响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第四个问题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与过去相比，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的范围扩大了，性质也严重了，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也不是偶然的，是冷战后中日关系和内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日本越来越起劲地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把中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也改变过去在二战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在经济政策上则加强对华投资中的政治色彩，把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与中国的军备、人权、民主挂钩。但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对日本也有长期的吸引力，所以中日关系倒退不符合双方的利益，困难再多也要设法改善，但双方关系既难以恢复到 70—80 年代的水平，也难以倒退到 50—60 年代的对抗状态。双方应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教授）认为，在分析朝鲜半岛局势的时候，除了分析中朝韩三国的关系外，更重要的还要从世界格局的高度来看，这个地区有中美俄日等大国的利益在这里交汇，形势错综复杂。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在这一地区有更重要的安全利益。同时，在分析朝鲜半岛局势时，也要超越意识形态，尤其不能从中国和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判断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虽然两国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两国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经受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受外部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影响相对过去而言是大大减少了。朝鲜半岛的变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会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所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应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主任，教授）重点分析了日中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他指出，这一变化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引起日本人对中国的一种怀疑；二是日本心态的变化，过去是经济大国，但政治上影响较小，不甘心，有意加强政治和外交的活动，突出日本的政治独立性；三是日本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受到的压力不一样。过去是老年人中多热心于中日友好，而现在许多日本青少年的想法是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谷源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认为，建立中日友好机制很重要，但实际并不容易，因为冷战思维还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在对外政策上则谋求日本的政治地位，并不断扩大其军事势力和军事影响，在台湾问题上也继续执行冷战时的政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在我们对日本的策略是否也需要作一些变动。现在韩中朝三国在谴责日本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上最坚决，但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改变了政策，对日本采取了较温和的立场。我们也不要民族主义情绪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批判日本不认罪的行为时，策略也应更讲究一些。更多地要寻找共同点，对分歧要灵活些。

谌取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认为，中日关系到了一个新时期，或

者说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摩擦增加的时期。中国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增加相互信任。对日美加强安保体系也要分析，可以认为，日美安保条约扩大的主要动力是美国要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是首要的，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是第二位的；这一条约也有针对日本的一面；也很难说没有对付俄罗斯的意思。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也要看到另一面，即日本主张中日友好的力量也在开展活动。日本外务省，日本企业界，日本自民党内，都有人在做工作，要加强日中接近，稳定中日关系，继续发展中日关系。

六、香港回归后的两岸关系

徐泽（国务院港澳办政务司副司长）在发言中指出，香港回归已经成为现实，香港以稳定、繁荣和平稳的状态跨进了祖国的大门，这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平稳过渡。这一局面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实现的。英国在主权问题、治权问题、怎样过渡等问题上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在过渡问题上，英国在机场问题，民主选举问题，土地基金问题上与中国一再不合作，所以香港能平稳过渡实在不容易。

李义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副教授）认为，香港回归为两岸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它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具有特别的示范作用。它在港人治港，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基本法，驻军法，调节行为规范，为香港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为两岸关系提供了借鉴意义。但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也有很大的不同，香港是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一国两制为中英两国所认同，而台湾不同，台当局不承认一国两制设想；香港是和平谈判解决的，而台湾问题则以和平谈判为主，但不承诺不使用武力；香港回归有明确的时间表，而台湾问题无法预定时间。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较香港更为宽松，大陆不派军队去台，台还可派人到中央任职。但总体上说，台湾问题较香港问题更复杂，涉及的面更广，时间会更长。在统一之前，两岸关系怎样过渡？基本的原则还是一个中国，但在理论上要更有说服力，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达成共识，两方领导人应进行互访和谈判，在保障两岸人民的利益方面达成共识，要争取民众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在台湾的一国两制模式上，应更有弹性和特色。